

格致学术译丛

决定时刻

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郭子林 赵宝海 魏霞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决定时刻

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郭子林 赵宝海 魏 霞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德)斯宾格勒
(Spengler, O.)著;郭子林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格致学术译丛)

书名原文:The Hour of Decision: Germany and World-
Historical Evolution

ISBN 978-7-5432-1635-8

I. 决… II. ①斯…②郭… III. 德国-现代史-研究
IV.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7060号

责任编辑 高璇

封面装帧 陈楠

格致学术译丛

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郭子林 赵宝海 魏霞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1635-8/K·176
定价 35.00元

总序

古老而智慧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绚烂的文化，先秦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基本界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并且演生为内在的精神价值，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规约着这片土地上亿万斯民的心灵世界。然而，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以及斯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不仅让我们对那些来自海洋异质文明的了解成为当务之急，而且在这种了解背后更承载着文化和现实的双重使命。自晚清第一批试图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译介西方学术文化，形成中国西学译介涓涓细流，递及民国时代新学人的大力引进而渐成滔滔之势。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习知，更希图通过对西学的了解，滋养和更生己国之国民精神，以实现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急切历史诉求。

时至今日，中国致力社会现代化的努力和全球趋于一体化并肩而行。尽管历史的情境迥异于往昔，但中国寻求精神补益和国家富强的基调鸣响依旧。在此种情形下，一方面是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仍然渴盼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图将之融入我们深邃的传统，为我们的文化智慧添加新的因子，进而萌发生长为深蕴人文气息、批判却宽容、自由与创造的思维方式。惟如此，中国的学术文化才会不断提升，中国的精神品格才会历久弥新，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最为坚实长久的支撑。

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辞辛劳地引介国外学术著作,对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均起了不容否认的作用。尤其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中国出版界的开放和繁荣,引进和翻译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更呈光大之势。

此等情形,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超越梦想的潜在表达——吸纳外来文化之精粹,实现自我之超越,进而达至民强而国富的梦想。一如中国经典所言:“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本社欲倾力推出“格致学术译丛”,其宗旨亦在于此。

我们期待能以“格致学术译丛”作为一个小小的平台,加入到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西学引介潮流中,为我们时代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精神建设添砖加瓦。热切地期盼能够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联手组构为共同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不图急切的事功,不事抽象的宏论,更不奢望一夜之间即能塑造出什么全新的美好物事。我们只须埋首做自己应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责,相信必有和风化雨之日。

陈恒
2009年7月

中译者序

奥斯特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历史形态学开创人。他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在青年时代,斯宾格勒不仅喜欢研究历史和艺术,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奇特风格。1904年,他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欠佳而未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巨大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但他一概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14日凌晨,斯宾格勒死于心脏病。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重要的有《西方的没落》、《决定时刻》、《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意志帝国的重建》、《人与技术》等。

斯宾格勒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的大多数作品却未能获得一致好评(事实上,很少有一致好评的作品),有时甚至批评者多于赞扬者,否定者多于肯定者。例如,《西方的没落》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大地上引起了强烈震动,有人用“骇人听闻”来形容斯宾格勒的某些观点,甚至有人把《西方的没落》斥为“历史的占卜”。

术”、“恶的预言书”等等。我国一些学者在接触到这部书以后，也认为作者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故而持否定态度，甚至久久未能译介到国内。斯宾格勒对这些反对意见和斥责之词一方面感到困惑，一方面以决裂的姿态予以回应，在《西方的没落》1922年的修订版前言里，他写道：“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继《西方的没落》之后而发表的第一部政论作品，实际上也是由《西方的没落》的一个注释展开来的，更是对德国局势的深入思考。事实上，《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的出版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甚至在德国曾一度被政府禁止出版，但它在被禁之前、甚至在被禁之后，创造了极高的销售记录，流传甚广。发行量之大本身足以说明这部作品的价值，而其出版受到禁止恐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论著的深刻与敏锐。如果说《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德国社会革命的中庸评价，那么《决定时刻》则体现了作者对德国革命的明确褒贬。但要理解《决定时刻》的内容和作者对革命的态度，恐怕需要首先认真阅读《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两者的侧重点因写作目的不同而不同，但两者都针对的是德国革命，所以要想使读者全面理解斯宾格勒关于德国革命的思想，使读者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在关系和各自的观点有个全面了解，我们必须先从《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谈起。

斯宾格勒对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局势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现实与形式》就是斯宾格勒在写一部时评著作的过程中灵光突现后一鼓作气写成的。同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起义者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德皇随之宣布退位，斯巴达克党人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居上，掌握了政权，于1920年1月对工人进行屠杀。1920年2月，政府在魏玛召开国民会议，魏玛共和国成立。4月，斯宾格勒生活的城市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后遭魏玛共和国镇压。虽然革命的烈火被扑灭，但共和国仍然危机四伏：

工人党仍在为革命寻找机会,保守派则对昔日的秩序念念不忘。是年岁末,在洞悉当时德国和世界各地的民族民族革命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局势的基础上,已经因《西方的没落》而声名远播的斯宾格勒,就德国当时的政治时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政论作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他首先对德国的革命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期革命相比较,然后分别对社会主义的类型、普鲁士主义的内涵与本质、马克思和共产国际等进行论述与考量,层层相扣,逻辑严谨,论述深入。纵观全文,他认为,社会主义有西班牙式的、英国式的和普鲁士式的三种。马克思虽然出生于德国,却成为英国式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英国的社会主义与普鲁士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种极端形式,维京人的后裔和骑士的后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精神与血气,在经济思想和关于自由的概念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德国的革命不过是这两种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与普鲁士人血气相合的普鲁士主义注定要在这场斗争中胜出,虽然当时的德国政权因二者之间的斗争而由议会民主派掌握。在他看来,魏玛共和国所体现的那种英国式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有悖于普鲁士精神中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注定不会长久维持。依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文化生命的阐释,欧洲文化已经进入了文化发展的晚期或最高阶段,也就是到了专制主义或恺撒主义时代。普鲁士主义所蕴含的建立独裁者进行专制统治的团体社会的要求,恰恰与这种文化晚期的恺撒主义形成对应。因此,斯宾格勒的政治取向就跃然于纸上。斯宾格勒也就变成了一个呼唤专制统治的到来以结束无政府的社会状态、复兴民族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当时各种保守主义政治构想层出不穷,相比之下,这本书并无特别之处,既没有得到保守主义的追捧,也没有得到激进派的反驳。

然而,当1933年3月德国建立起他盼望已久的独裁统治之时,他却自己的书中对这位令无数保守派人士为之倾倒的领袖表示自己的不屑,这本书就是斯宾格勒的最后一部政论著作《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

史的演变》。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当时德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深入分析,阐明德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唤起德国政府当局和德国民众的“觉醒”和“警觉”,并希望德国政府和民众迅速做出决定和采取“进攻”措施,做好应对种种潜在危险的准备。

他在书中延续《西方的没落》中的那种悲观主义论调,在运用文化命运的观相术进行一番“透视”后作出又一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预言。他指出,由于欧洲白人国家中劳工力量的膨胀,整个社会不得不人为地向工人支付“政治工资”,这促使资本家将工厂迁往欧洲以外的地区,以靠近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这也就是所谓的“白人的世界战争”。有色人种世界,就是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它们不从白人殖民者那里学习先进工业技术,而且对白人世界中爆发的革命所具有的力量心领神会,更在世界大战中看到欧洲世界的软弱。包括东方的俄国、日本在内有色人种国家正在发动对抗欧洲的种族间的“世界战争”。因此,白人世界陷入了内部阶级战争与外部民族战争的双重危机之中。在斯宾格勒看来,一旦这种危机同时爆发,西方文明行即覆灭。如果说“白人的世界革命”是众人皆知的现实危险的话,“有色人种的世界革命”则充分地体现了斯宾格勒的洞察力。但在第三世界的革命到来之前,东西方主要民族国家之间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他对战争中崛起的美国的判断也体现了自己对这个前英格兰殖民地的无知。

在西方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德国处境十分危险。德国作为欧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首先要担负起带领各国渡过危机的责任。因此,斯宾格勒主张,只有在白人世界里弘扬团结、纪律和自足的普鲁士主义,才能使西方民族重新振作并强大起来,渡过危机。斯宾格勒一贯宣扬的这种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不谋而合。于是,纳粹党人力邀斯宾格勒加入其中,并希望把他和尼采一起作为自己的精神先驱,但遭到斯宾格勒的拒绝。因为斯宾格勒非常反感纳粹党极端的反犹主义,在他看来,种族并非生物性的,而是以群体的文化与精神传统为基础的;曾与他短暂接触过的希特勒没有给斯宾格勒留下

好印象。在《决定时刻》一书的草稿中就包括对国家社会党的批评。然而，就在此书正式出版之时，希特勒掌握了政权。作者不得不对现实做出有限的让步：选择一个较为中性的题目；加了一篇看起来是向新上台的当权者“示好”的序言；直接删除原稿六十多页内容，所以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本书逻辑混乱，译者认为这恰恰与此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这部政论中暗含的锋芒还是刺痛了纳粹党。在第一节中，斯宾格勒就对纳粹党提出批评：“国家社会党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将世界置于一旁，或者与之对抗，他们搭建着自己的空中楼阁，丝毫不顾来自国外的强烈反应”；而在书的末尾，他直接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判决书：“三十年代法西斯将被一种新的不可预知的形式所代替，甚至当前盛行的民族主义也会消失”；他还在书中影射希特勒是英雄般的男高音。这本书在三个月内就卖出十万本。纳粹党人终于有所察觉，《决定时刻》被列入禁书名单，斯宾格勒的名字也在德国所有媒体上消失了。这可以说是斯宾格勒晚年获得的最高荣誉。

可以说，作者在《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还在热情地为德国革命指明方向——建立一个独裁政权，以便结束无政府主义状态。但是，当历史的车轮滚入20世纪30年代时，世界局势尤其欧洲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德国如他所料地进入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他并没有从中看到他理想中的真正德国革命，因此他在《决定时刻》一书中又对德国的进一步革命提出了高要求，这次是为了保卫德国的存在而早日做好准备，向“白人世界的革命”和“有色人种的革命”进攻，以便掌握世界的发展方向。

斯宾格勒在这两部作品中，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深入翔实地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局势，涉及了当时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当时世人瞩目的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从总体上看，作者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抱有很强烈的偏见。作者是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为德国的发展与存在而忧国忧民的政论者的身份写作这两部书的，他代表的是德国“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他的立场决定了他对共产

主义的错误认识,把共产主义假想为德国乃至白人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敌人,从而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极尽能事的讽刺与批判。同时,这也反映了斯宾格勒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知。但是,斯宾格勒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攻击共产主义,他只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并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无知而进行了有偏见的评论,与魏特夫存在写作意图上的根本不同。

出生于德国、20世纪3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的犹太人卡尔·魏特夫,一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于1957年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旁征博引,把古代世界十几个古老文明都纳入到著作当中,杜撰出了所谓的“治水专制主义”的东方专制主义,认为东方包括中国在内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的社会。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将这本著作翻译成了中文,立刻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祖德和陈启能两位先生联合全国各主要研究所和院校的著名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学者,从中国古代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等的具体情况出发,用大量的事实论证,批驳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荒谬性,明确指出了魏特夫观点的别有用心之处。^①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行文充斥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之词,乍看起来,决不可译介为中文,但为了辨别真伪,追求真理,蠹清是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是把其翻译成了中文,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触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学术讨论的结果使人们更加认清了魏特夫理论的错谬和荒诞。

斯宾格勒的史学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西方的没落》、《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和《人与技术》均有中文译本出版,^②但斯宾格勒最后的政论著作《决定时刻》尚无中文译本,这是本书翻译出版的一个理由。

- ① 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 ② 邹国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西方的没落》在大陆、台湾均有节译本出版,英译全译本已经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6年出版,吴琼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董兆孚译的《人与技术》;1941年,刘檀贵译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Preussent umund Sozialismus*)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中译本附录一的《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但我们并没有在国内找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一书。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就学术意义而言,斯宾格勒的另一部作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是很有价值的作品,也能体现作者的很多观点,甚至可以说是理解《决定时刻》的一部重要相关作品,故而我们将其放在《决定时刻》的末尾译出,作为附录,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两部相互关联的作品中更全面地理解斯宾格勒的思想。

本书是由郭子林、赵宝海、魏霞共同翻译完成的,而赵宝海和魏霞二人对本书的初译和注释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中译者序的部分内容也出自他们二位之手。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咨询了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我们的朋友王秦伟先生和陈恒教授对我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理解,谨致诚挚谢意。格致出版社的高璇编辑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对本书的编辑校对付出了很多宝贵时间和大量心血,特致真诚的谢意。当然,尽管我们旨在尽一切努力使译稿完美无疵,但译介外文作品实属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无论我们怎样地认真仔细,译文之中还是会有某些纰漏,敬请专家批评指正,以便日后做更为深入的修改和完善。

郭子林

2009年6月16日 于北京

人令其引学由我坐印典。(arabico)封春由史似斯以对不所。(arabicus) 新幸味大补。由言可新幸向由言宋果,由制恐了断张果由故因,由对对

序言^①

人的大献科由土界出由故坐,天令。拜由天限由非,假兼可不。小张由大拜由中命坐主自补送未法发由自自教器在配替由人老那由

。直符由去春有故由,人的于日空说狂暴只是限于至五真由献了不并自成由。博别由理野自自院美帝丝人的中候于式因,守博派去端下青野野由,拜目一社款香登由由果成。由那由拜目内研固固于夫恭因由,是深禁由由由。深意的人去去不从拜整由由去要果表由大补由家学史似(由土义家五真)。社知人拜而果那由由事心天,才未会能呼新固,野五去藏要拜及近配托,辞真史似由为个个假那由

没有人比我更加期盼今年(1933年)的民族革命。1918年那场革命一开始,我就对其深恶痛绝。1914年,我们民族中强大而有活力的人们挺身而出,相信自己能够而且将会获得胜利,而1918年的革命却是我们民族中下层人士对1914年革命人士的背叛。自1918年起,我所写作的有关政治本性的所有文章,都在直接地反对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在我们敌人的帮助下壮大,以我们巨大的悲惨与不幸为基础,旨在构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未来。我所写的每一行文字都旨在推翻这些力量。我希望自己的努力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危机中,如果我们想同他人一样有自己的发言权,并有所行动,而不只是成为他人的牺牲品,那么我们便不得不采取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行动,以便从那种负担中释放我们血液最深处的本能。世界政治的伟大博弈尚未结束,此刻正是豪赌之时。每个现有的国家要么更加强大,要么一蹶不振。但是,今年的这些事件允许我们抱有这样的期望,即我们德国人应该做出抉择,也就是说,我们迟早会像俾斯麦时代那样,再度成为历史的主体

① 该中译本根据查尔斯·弗兰西斯·阿特金森(Charls Francis Atkinson)的英译本译出,英译本首版于1934年。该中译本的所有脚注都是译者所加,原文注释和英译者注都列在每章后面作为尾注,原文(德文)注释不特别说明,而英文注释则会在注释中标明。

x (subjects),而不仅仅做历史的客体(objects)。我们生活的年代是令人惊叹的,因此也是充满了恐怖的,是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的。伟大和幸福不可兼得,我们别无选择。今天,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幸福,但很多人能够通过锻炼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己生命中的伟大或渺小。至于那些只想过舒适日子的人,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

行动中的人经常受到自己视野的限制。他为自己并不了解的真正目标所驱使。如果他能够看清这一目标,他便很有可能去抵制它,因为命运的逻辑从不考虑人的意愿。但通常的情况是,他因迷失于周围和内心事物的假象而误入歧途。(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伟大任务是理解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并通过这种理解去正视、阐释和描绘未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但未来终将到来。如果没有创造性的、预测性的、警示性的和引导性的批判,那么像当前这样如此自觉的时代是不可能被人们所理解的。

xi 我既不会责骂,也不会夸赞。我不会对那些即将形成的事物做任何评估。只有当一个事件变成了遥远的过去,真实的评价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事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好的或坏的最终结果也早就变成事实了。在上世纪结束之前,没有任何人真正地理解拿破仑(Napoleon),甚至至今我们还未能形成对俾斯麦的最终看法。唯独事实是永恒的,而判断却是摇摆不定和变化无常的。总而言之,一个伟大事件无需同时代的评价。当伟大事件的同时代人都已不复存在时,历史本身将会对伟大事件做出判断。

然而,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了:1933年的民族革命是一个非凡的现象,它在未来人们的眼中也将始终是这样一个事件,因为与这次民族革命一起到来的是自然的、超个人的力量以及贯彻始终的精神原则。这其中有一些是普鲁士人一贯的特质。正如1914年革命那样,1933年的民族革命立刻改变了人们的心灵。德国的“空想家们”平静而纯真地坚持开创未来之路。但是,那些参与1933年革命的人们都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胜利,因为没有遇到敌手。新兴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

以至于它会将曾经或仍旧活跃的事物全部清除。这是一个尚待通过苦战方能赢得未来胜利的承诺，而现在仅仅为未来战争清理了战场。因此，领袖们担负着全部责任，而这需要他们认清或领会责任的全部意义。这个使命充满了巨大的危险。这个使命的范围不在德国疆界之内，而是超越了德国，处于世界政治意义上的战争与浩劫的王国之中。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德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命运更加休戚相关。任何国家都不会像德国这样无法摆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况且，1933年的民族革命并不是发生在欧洲的第一场民族革命，因为已经有克伦威尔(Cromwell)和米拉波(Mirabeau)领导的革命了，但它却是第一个在政治上无助、局势上异常危险的国家发生的革命，这一事实给民族革命的使命带来了无数的困难。

所有这些使命都刚刚浮现，它们几乎未被人们把握，尚未得到解决。现在还不是庆祝成功的时候或时刻。谁把动员误以为是胜利，谁就会倒霉！一场运动刚刚开始，尚未达到目标，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也绝不会因为这场运动而发生改变。这些问题不仅与德国有关，还与整个世界有关。这些问题不是几年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纪的问题。狂热分子的危险在于他们把局势看得过于简单。这种狂热正在脱离几个世纪之前便已确定的目标。然而，真正的历史抉择正是从这些目标开始的。

在强大与软弱的混乱漩涡中，夺权的事情发生了。当我看到新生政权连日大张旗鼓地庆祝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疑虑。最好省下一些狂热，留给真正确切的结果出现的那一天，也就是说，把一部分狂热留给外交政策成功的那一天，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当这些目标已经实现时，此刻的人们，曾迈出了革命第一步的人们，可能都已经死了，或者已经被遗忘了，甚至正遭受着冷嘲热讽，只有他们的子孙会偶尔回想起他们的重要意义。历史不会伤感，但它会使伤感之人自食恶果！

任何像这种以政治混乱为开端的运动，都有很多可能的发展，但参与者往往并不能真正地理解这一点。运动可能因过多的原则和理论而

僵化；运动可能在政治、社会或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中失败，或因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开始对自身产生怀疑。在1793年的巴黎，人们确实感到“形势恐怕会变化”(que ça changerait)。一时的沉醉经常会将未来的可能性毁灭于萌芽状态，随之发生的便是对下一步行动的失望和不确定。掌权者心安理得地把持着权力，并期盼这种暂时的状态会永远地持续下去。正确的思想因幻想而被夸大到忘乎所以，而起初那些伟大诺言最终在悲剧或喜剧中结束。如果我们立即冷静地直面这些危险，我们就可以比过去一代的很多人更明智一些。

但是，如果想为一个未来几代人才可以建立起来的伟大未来奠定稳固的基础，古代传统就必须继续起作用。在我们血液中遗传下来的是无言的信念，是唯一能够永远赋予我们未来的东西。多年前我所说的“普鲁士主义”(Preussentum)是很重要的，准确地讲，已经经受了检验的正是这个普鲁士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无论德国人怎样描述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都没有经受过检验。我们需要的是以普鲁士人的标准进行的教育。普鲁士主义在1870年和1914年显现出来，却仍作为一种持久的潜能沉睡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只有通过鲜活的事例和统治阶级的道德自律而非说教或强势力量，普鲁士主义才能实现。人们若想把某种理想付诸实践，就需要掌控自己，并在内心深处做好为信仰而牺牲的准备。把为理想而牺牲与某个纲领(program)中书生气的冲动相混淆，是对整个问题的无知。

这把我带回到了1919年出版的《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Prussianism and Socialism*)一书，¹我在这部书中指出，没有这个精神上必要的普鲁士主义，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建筑。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都从各自的历史中继承某种特质。我们没有文明化的历史，因此仍然需要唤醒、发扬、培养沉睡在我们血液中的特质。

本书是在同一主题下所做的研究的第一部分。我在书中坚持以往的风格。也就是说，我没有为未来提供充满希望的图景，更不会——像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盛行的那样——提出实现未来图景的计划，而是勾勒一幅关于现在和未来事态的清晰图画。我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我不仅

看到了极大的可能性,也预见巨大的危险以及这些危险的根源和可能的避免方法。如果其他人没有勇气去预见并讲出他所预见到的一切,我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反复地证明了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将会发生,所以我有权利去批评。一系列决定性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没有任何既定事实会被消除,因此我们都不得不走向特殊的道路,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对这条道路的拒绝将是短视和懦弱的表现。个人不愿意做的,历史将代为完成。

但是,对这条道路表示赞同便预示着理解了这一点,而本书正是旨在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我们都不得不走向特殊的道路,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危险总是存在。每个采取行动的人都处在危险之中。危险就是生命本身。但那些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人,一定会遭遇这些可预见的危险,而预见这些危险可能需要最大的勇气。

本书源于1929年我在汉堡(Hamburg)做的一次没有引起共鸣的演讲:《危险中的德国》(*Germany in Danger*)。²1932年11月,我开始拓展这一主题,仍然以德国当前形势为基础。到1933年1月30日,我已经写了106页。我没有对其做任何改动,因为我不是为几个月后或明年而写作,而是为了未来。真相不会因一个事件而化为乌有。我只是改换了题目,以避免误解。并不是说国家政权的更替是一种危险;危险早就存在了——其中一些危险可以回溯到1918年,其他的危险比1918年还要早,而且危险仍然存在,因为某个单独的事件并不能彻底消除危险,在消除危险的行动取得效果之前,必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种消除危险的行动的方向要正确。德国正处于危险之中。我对德国的担心一直没有减少。3月份的胜利^①太过容易,这使胜利者无法认清危险的程度和其根源及其持续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形式、局面和人物会从这场巨变中出现,或者

①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将独裁权授予希特勒。